

# 职业教育、社会排斥与阶层流动

## ——一个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张 罗

**[摘 要]** 职业教育在促进阶层流动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揭示其中的内在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检验职业教育、社会排斥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职业教育能显著降低阶层向上流动,社会排斥在职业教育与阶层流动作用中存在三条中介路径:一是经济排斥的单独中介作用;二是经济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的链式中介作用;三是政治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的链式中介作用。此外,结果表明上述影响路径还存在城乡异质性。基于此,为促进职业教育有效提升阶层流动,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保持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下,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二是破除“唯学历”的社会人才评价标准,加强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综合能力的考察与筛选;三是吸纳多元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尤其要重视农村背景职教生的社会权利与政治教育,提升学生获取与维护权益的能力。

**[关键词]** 职业教育;社会排斥;阶层流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

**[作者简介]** 张罗,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4)0009-0065-09

###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社会阶层合理流动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与阶层流动的关系在学界备受争议。一方面,坚持教育功能主义的学者认为,职业教育能够授予受教育者专业技术技能,提升其社会生产能力,积累人力资本,帮助职教毕业生降低失业风险,实现阶层向上流动<sup>[1][2]</sup>。另一方面,批判教育主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实际是社会分层的工具,是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社会化的过程,是一种阶层不平等的复制<sup>[3]</sup>。弱势群体被筛选后,通过职业教育合法化不平等的

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进入社会后仍然被困在底层,无法实现阶层向上流动<sup>[4]</sup>。这两种观点揭示了职业教育作用于阶层流动的应然与实然状态,理想中的职业教育应是前者的体现,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似乎走向了后者。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将显著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大幅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作为主要目标<sup>[5]</sup>。该目标从侧面也反映了职业教育群体社会阶层不高的现实,提高其阶层认同刻不容缓。

当前,已有实证研究反映了我国职业教育与社会阶层的部分现实,研究结论一致性较高,即与本科群体相比,高职教育群体职业地位显著偏低<sup>[6]</sup>,高职教育“分流器”效应明显,难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sup>[7]</sup>。但以往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或回归分析方法,大多聚焦于职业教育影响社会阶层的单一静态结果,基本没有涉及对其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然而,职业教育对阶层流动的作用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只有更深入地理解和揭示其中的机制机理,才能更好地找到提升职业教育促进阶层流动的有效路径。实际上,职业教育之所以无力推动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职业教育被社会主流制度排斥在竞争场域之外。因此,本研究将引入社会排斥理论,探究职业教育与阶层流动之间复杂的作用机制。社会排斥理论是基于多维、动态视角揭示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被社会排斥而进入社会边缘位置的一种分析理论<sup>[8]</sup>,近年来被世界各国政府与学界广泛运用于分析和解决社会歧视、贫富差距过大以及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sup>[9]</sup>。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并且中等职业教育升学趋势逐渐加大,学历层次将进一步提高。因此,本研究基于时代性与发展性原则,选择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群体作为研究样本。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构建一个职业教育、社会排斥与阶层流动的理论分析模型,反映三者的作用机制,并通过量化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相关的政策变革提供新的思路。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职业教育与阶层流动

社会阶层分为主观社会阶层与客观社会阶层,主观社会阶层是指个体对自身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位置的感知<sup>[10]</sup>,客观社会阶层则由个体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多个要素综合决定<sup>[11]</sup>。有学者认为,主观社会阶层是对客观社会阶层的主观判断,是一种基于社会物质资

源的心理与社会反应<sup>[12]</sup>。阶层流动则是指个体从一种社会阶层转移到另一种社会阶层的现象。从转移的方向来看,可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从参照系来看,又可分为与个体自身基点相对比的代内流动,以及与上一代相对比的代际流动<sup>[13]</sup>。由于客观阶层需要被主观感知才能与社会态度和行为逻辑相关联<sup>[14]</sup>,同时代际阶层流动更能反映个体摆脱家庭资本影响而单纯依靠教育作用实现的阶层变动。因此,本研究将采用代际间主观阶层流动感知来衡量阶层流动水平。

在我国,普职分流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常被看作是为差生提供的无奈选择,其生源多来自农村等社会弱势群体,自然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教育类型<sup>[15]</sup>。布迪厄资本与社会分层理论认为,资本是个体与阶级在社会空间中互相斗争以保卫和夺取有利社会位置的资源<sup>[16]</sup>。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具有独立性的符号资本<sup>[17]</sup>。其中,教育系统控制着文化资本生产、传递与转化,并以此来达到支配社会地位的目的<sup>[18]</sup>。同样的,文凭作为社会人才评价制度的产物,可以将其看作一种符号资本,是一种受到社会认可的以符号化方式存在的稀缺资源<sup>[19]</sup>,这种符号资本同样联系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一方面,基于职业教育群体大多继承父辈家庭匮乏的文化资本,加之职业教育本身办学条件较差,教学质量不高<sup>[20]</sup>,以及社会中传闻职教学生就是“混日子”等,可以认为职业教育在文化资本生产上处于劣势。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文凭社会认可度低,职校学生也被贴上“差等生”的标签,可以认为其符号资本同样不占优势。而这些弱势资本将通过惯习的塑造,最终导致职业教育群体的阶层再生产。基于此,提出假设H1:职业教育会显著降低阶层向上流动。

### (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1975年,由法国学者勒内提出。勒内将残

障者、自杀者、老年病患、受虐儿童等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人划为受到社会排斥的群体。而在后续研究中,这一群体的范围逐步扩大,排斥内容主要涉及生计、收入、住房、福利待遇等方面<sup>[21]</sup>。然而,社会排斥的定义却未被明确界定。欧洲委员会将社会排斥定义为对基于公民资格的权利——主要是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sup>[22]</sup>。奥德比尤恩(Oddbjørn)等认为,如果一位青年人被排除在学习与工作的结构化环境之外,并且有很大可能在未来也一直远离这些位置,可以认定其受到了社会排斥<sup>[23]</sup>。约翰·皮尔森(John Pierson)认为,社会排斥是对个人和家庭、群体和社区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所需要资源的全面剥夺过程。贫穷与低收入是首要因素,还包括歧视、教育程度低和生活环境差等其他因素<sup>[24]</sup>。学者从诸多定义中总结出了社会排斥的主要特征:一是该理论用于分析社会弱势群体的窘迫处境;二是社会排斥包括社会诸多方面;三是社会排斥表达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结果<sup>[25]</sup>。

与贫穷理论不同的是,社会排斥不是一个单单表达“缺乏金钱”的术语,而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sup>[26]</sup>。其维度大致分为以下几类<sup>[27]</sup>:一是经济排斥,是指个人在生产、交换、消费等方面被排除在一般社会成员之外的状态和过程,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收入排斥和消费排斥;二是政治排斥,是指个体或团体被排除于政治决策之外,难以享有正当的政治权利;三是社会福利排斥,是指个人难以获取与其他社会群体等同的社会公共服务,如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等;四是社会关系排斥,是指个人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体现在社会交往人数下降、社会网络关系薄弱等<sup>[28]</sup>。

由于在现有研究中很难发现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差异,预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本研究对社会排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前述三个维度上。

从教育信号理论来看,教育具有信号功能,

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彰显个体能力,使其获取相应的市场价值<sup>[29]</sup>。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就业市场门槛不断提高,导致文凭信号作用贬值<sup>[30]</sup>,为此也进一步降低了职业教育文凭的价值。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阻碍了受教育者进入较高声望职业的道路,而将其导向了低层次的行业与职位<sup>[31]</sup>。换句话说,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看,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大多进入了次级劳动力市场,受到了劳动力市场排斥。多灵戈等学者认为次要劳动力市场报酬低、福利待遇差、工作不稳定性高、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晋升机制缺乏,次级劳动力市场主要集中在边缘经济部门,而主要劳动力市场恰恰相反<sup>[32]</sup>。由此可见,社会福利与劳动力市场以及职业层次高低紧密绑定在一起。此外,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将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而职业层次决定了社会资源占有的方式和水平,因此职业声望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衡量指标<sup>[33]</sup>,职业声望的高低影响着社会成员对其阶层的认同程度。此外,有研究认为社会福利具有诸多非货币特性的内在价值,能为个人提供社会尊重度、成就感、安全感等,这些心理体验是社会阶层感知的重要来源<sup>[34]</sup>。基于此,提出假设H2:职业教育通过正向预测经济排斥,进而降低阶层流动,即经济排斥在职业教育降低阶层向上流动中起中介作用;假设H3:职业教育依次通过经济排斥、社会福利排斥而降低阶层流动,也即经济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在职业教育降低阶层向上流动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政治活动包括选举与非选举活动,非选举活动主要是指参加政党、工会、社区组织等<sup>[35]</sup>。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全人民、全过程民主,公众选举权能够得到普遍保障。因此,本研究对政治排斥的衡量主要集中在非选举活动的工会组织参与上。工会是企业员工的利益代表和发声者,是调解员工与企业经营者矛盾的法定组织,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为维护保障员工福利。姚洋等人基于数据资料得出了中国工会能够提高



工人福利这一结论<sup>[36]</sup>。就职教系统而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将影响政府、企业等多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例如,在多党制、单一制的丹麦,雇主协会与工会高度协作,在职业教育改革中起主导作用<sup>[37]</sup>。但我国职业教育主要集中于学校教育,企业参与热情和程度一直不高,工会对职教的影响甚小。相应的,职业教育群体对工会组织认知与参与的政治意识也偏低。基于此,提出假设H4:职业教育依次通过政治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进而降低阶层流动,即政治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在职业教育降低阶层向上流动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出职业教育、社会排斥与阶层流动的理论模型路径图(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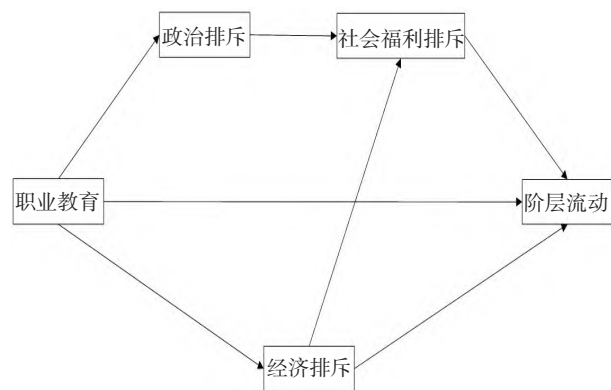


图1 职业教育、社会排斥与阶层流动作用机制理论模型

### 三、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18年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个人问卷数据,该调查以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对象,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村居进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调查议题包括劳动力的家庭状况、教育、就业、社会阶层等。本研究选用高等教育学历层次群体样本,经清洗和整理后,样本量共计1623份。

####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阶层流动。调查问卷采用经典Mac Arthur社会阶层测量量表,测量时给被试呈现一个10级阶梯,从下至上代表社会十个等级的阶层位置,要求被试评定自己属

于梯子的哪一级,最高的“10”分代表最顶层,最低的“1”分代表最底层。参考刘帅等的做法<sup>[38]</sup>,构建一个虚拟变量,若题项“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减去“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的差值大于0,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核心解释变量为职业教育,若最后学历程度为高职教育,赋值为1,否则为0。

在本研究中,中介变量涉及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和社会福利排斥三个方面。借鉴已有经验<sup>[39]</sup>,经济排斥以劳动力市场排斥为核心指标,问卷中“您这份工作属于以下哪种?”,选项中包括有单位的工作,如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单位等;无单位工作,包括务农、无固定工作等。非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工作意味着收入状况差、职业稳定性低、职业声望低,属于被排斥在核心劳动力市场之外,因而赋值为1;有单位则赋值为0。政治排斥以“去年您是否参加单位/企业的工会活动?”衡量,若未参加则可以被视为遭受政治排斥,赋值为1,否则为0。社会福利排斥以是否具有养老保险进行衡量,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若不具有养老保险,则表明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制度之外,赋值为1,否则为0。

本研究纳入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两个层面。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户籍。已有研究证明,女性阶层认同显著高于男性,并且这一结论在不同年份与年龄中均成立<sup>[40]</sup>。刘云波等研究了职业教育社会地位获得的年龄效应,年龄因素与社会分层的相关性显著增长<sup>[41]</sup>。此外,婚姻匹配被证实是支持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一种方式<sup>[42]</sup>,户籍城乡二元制对我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等方面也不可忽视。家庭特征包括父母职业声望、父母受教育水平,以上变量均是决定父辈社会阶层的关键因素。父母职业声望按高低分为7级,1级为最高级,即“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7级为最低级,即“不方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父母受教育水平,按“未上过

小学”到“博士”,分别从“1”赋值到“11”<sup>①</sup>。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以及变量按是否能实现阶层流动分组比较的结果见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          | 全样本       |       | 分组     |        |           |
|----------|-----------|-------|--------|--------|-----------|
|          | 均值/<br>比例 | 标准差   | 阶层流动   | 阶层固化   | 差异        |
| 阶层流动     | 0.548     | 0.012 | /      | /      | /         |
| 职业教育     | 0.499     | 0.012 | 0.497  | 0.502  | -0.005    |
| 经济排斥     | 0.232     | 0.010 | 0.0204 | 0.267  | -0.063**  |
| 政治排斥     | 0.707     | 0.011 | 0.684  | 0.734  | -0.050*   |
| 社会福利排斥   | 0.225     | 0.010 | 0.199  | 0.256  | -0.057*** |
| 性别(女=1)  | 0.532     | 0.012 | 0.512  | 0.556  | -0.044    |
| 年龄       | 41.383    | 0.247 | 42.026 | 40.605 | 1.421**   |
| 婚姻(已婚=1) | 0.687     | 0.012 | 0.709  | 0.661  | 0.048*    |
| 户籍(城镇=1) | 0.702     | 0.011 | 0.667  | 0.744  | -0.077*** |
| 父亲职业声望   | 4.599     | 0.051 | 4.853  | 4.292  | 0.561***  |
| 母亲职业声望   | 5.034     | 0.045 | 5.183  | 4.854  | 0.329***  |
| 父亲受教育水平  | 3.579     | 0.055 | 3.231  | 4.001  | -0.770*** |
| 母亲受教育水平  | 2.984     | 0.048 | 2.648  | 3.391  | -0.743*** |

注:显著性\*p<0.05,\*\*p<0.01,\*\*\*p<0.001,下表图同。

由表1可知,认为能实现代际阶层向上流动的比例略超过一半。从阶层流动与否的分组比较来看,职业教育群体比例相差无几,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因此,职业教育对阶层流动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而对于社会排斥来讲,阶层流动组受到经济排斥的比例要比阶层固化组少6.3%,二者差值在0.01水平上显著。政治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阶层流动组也分别少5%与5.7%,均具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社会排斥对阶层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个体特征层面,性别因素在两组之间差异不大;年龄方面,阶层流动的群体年龄显著高于阶层固化组,这可能与社会地位和资本的时间积累有关;阶层流动组的已婚比例也相对较高;而阶层流动组的城镇户口比例要显著低7.7%,说

明农村出身的群体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家庭特征层面,与阶层固化组相比,阶层流动组的父母职业声望与受教育水平均显著更低,这同样说明了阶层流动群体的家庭条件起点不高,而一旦有机会脱离原生家庭阶层的继承,他们对阶层流动的感知就越明显。

### (三)计量模型

由于本研究的被解释为离散型变量,同时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职业教育、社会排斥与阶层流动等变量之间的因果路径关系,因此借鉴陈纯槿的研究经验<sup>[43]</sup>,采用适配度更高的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进行估计,该模型能很好地用于测算定序或定类的离散变量。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学背景群体之间变量影响效应的异质性,本研究将按城乡差异进行分组检验。

##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 (一)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影响路径分析

以职业教育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社会排斥中的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福利排斥作为中介变量,阶层流动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得到变量之间相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图2)。

从图2可知,在控制了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后,职业教育会负向预测阶层流动。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将显著降低社会群体代际向上流动趋势,假设H1得到验证。这也支持了教育符号资本论的观点,教育经历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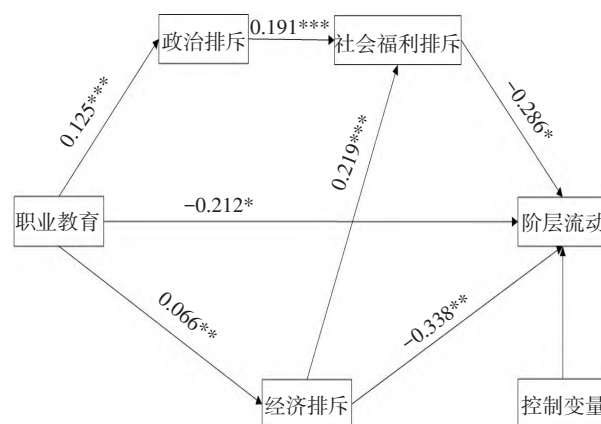


图2 广义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

一种与阶层认同直接挂钩的符号标签,这种符号将伴随个体整个生命历程。这种认知通过社会文化而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形成一种被社会主流意识所默认的文化习惯。职业教育在分流时就被看作是次等教育,接受次等教育意味着进入次等阶层,因而个体难以产生阶层流动感知。

关于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职业教育能正向预测经济排斥,经济排斥将负向预测阶层流动,经济排斥中介效应成立,假设 H2 得到证实。这说明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遭受劳动力市场排斥,经过基于文凭信号的市场筛选后,职业教育群体将进入外围劳动力市场,职业条件较差,晋升机会也不大。而离开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后,阶层流动也越发艰难,阶层固化倾向进一步加重。不仅如此,经济排斥还将正向预测社会福利排斥,而社会福利排斥会负向影响阶层流动,经济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假设 H3 得到验证。这说明职业教育群体进入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将带来更加薄弱的社会福利待遇,对比主流社会成员,这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将造成强烈的剥夺感,降低其社会阶层认同。政治排斥方面,职业教育会对政治排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政治排斥将正向预测社会福利排斥,进而降低阶层流动,政治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假设 H4 得到证实。这说明职业教育的确会降低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和行动,这可能与职业教育的动机与内容密切相关。从鲍尔斯和金帝斯的符应理论来看,职业教育只需要培养适合社会生产的产业工人即可,通过教育系统完成对其社会规则与意识的驯化<sup>[44]</sup>,使其对现有社会关系进入一种无意识状态,从而接受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合理性。由此,政治排斥的产生将导致职教群体忽视对社会福利的争取,使其在工作上得不到相应的福利保障,而再次进入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消极路径。

总体来看,由模型估计影响效应分解的结

果可知,职业教育对阶层流动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作用,社会排斥各个维度的间接效应也同样显著,因此社会排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二)城乡异质性分析

我国户籍城乡二元制对社会资源配置影响显著,上文的影响效应只是整体上的表现,是否同样适用于城乡不同群体还需进一步检验。本研究分城乡两个样本逐一进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表2)。从分样本结果来看,城乡之间影响路径发生了较大差异。对于城镇户籍的群体而言,职业教育对阶层流动的直接效应仍然存在,即职业教育会显著降低阶层流动。但社会福利排斥对阶层流动的影响却不再显著,这说明在城镇群体中,以社会福利排斥为桥梁的链式中介效应不成立。但经济排斥对阶层流动的负向影响依旧显著,同时职业教育也能正向预测经济排斥,故而经济排斥的中介效应成立,并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差异较大的是,对于农村户籍的群体来讲,职业教育对阶层流动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排斥也不能显著预测阶层流动,不仅如此,职业教育也无法预测经济排斥。最终,

表2 城乡异质性检验结果

| 变量     | 城镇        |       |        | 农村       |       |        |
|--------|-----------|-------|--------|----------|-------|--------|
|        | β         | S.E.  | Z      | β        | S.E.  | Z      |
| 阶层流动   |           |       |        |          |       |        |
| 职业教育   | -0.330**  | 0.129 | -2.553 | 0.140    | 0.203 | 0.692  |
| 社会福利排斥 | -0.241    | 0.178 | -1.351 | -0.449*  | 0.220 | -2.045 |
| 经济排斥   | -0.548*** | 0.160 | -3.431 | 0.119    | 0.225 | 0.531  |
| 控制变量   | YES       |       |        | YES      |       |        |
| 社会福利排斥 |           |       |        |          |       |        |
| 经济排斥   | 0.176***  | 0.028 | 6.338  | 0.293*** | 0.045 | 6.350  |
| 政治排斥   | 0.152***  | 0.024 | 6.433  | 0.243*** | 0.061 | 3.982  |
| 经济排斥   |           |       |        |          |       |        |
| 职业教育   | 0.079**   | 0.024 | 3.253  | 0.003    | 0.042 | 0.065  |
| 政治排斥   |           |       |        |          |       |        |
| 职业教育   | 0.104***  | 0.028 | 3.676  | 0.077*   | 0.032 | 2.448  |



只剩下“职业教育—政治排斥—社会福利排斥—阶层流动”这一条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路径,并且该链式中介路径表现出完全的中介效应。经过城乡异质性对比可以发现,就城镇群体而言,职业教育这个符号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原因可能是这一群体家庭的经济、文化资本本身就比较优越,如果群体中其他成员进入大学,而自身进入职校,两相对比之下就显得低人一等。而且,较为优质的职业类型大多集中于城市,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门槛相对更高,因此经济排斥的作用更为明显。相反的,对于农村户籍群体而言,相对较低的就业门槛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并不明显。但农村群体最为突出的是社会福利排斥,他们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加之职业教育主要聚焦技术技能训练,忽视了社会政治参与的教育,导致其维权意识相当薄弱,社会福利得不到有效保障,阶层向上流动受到较大阻碍。

## 五、结论与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职业教育承担的作用愈发凸显,如何实现职业教育困境突围,使其发挥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积极功能,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有学者从社会排斥视角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境<sup>[45]</sup>,本研究将此观点进行了延展和丰富,构建了一个职业教育、社会排斥与阶层流动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并通过广义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其中的运作机理。主要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职业教育显著影响阶层流动,相较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将显著降低个体代际阶层向上流动感知。这与王奕俊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sup>[46]</sup>,其中的影响机制可能在于职业教育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属性,这些属性映射在现实中即是“低下的职业教育”信号效应与教育质量。

第二,职业教育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排斥,进而负向作用于阶层流动;同时,经济排斥还能正

向影响社会福利排斥,从而进一步降低阶层流动。经济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在职业教育影响阶层流动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职业教育群体大多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声望不高、薪资报酬少、福利待遇差,不良的就业环境将导致社会阶层再生产。这与“教育与职业分层论”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sup>[47]</sup>。

第三,职业教育以此通过正向影响政治排斥、社会福利排斥,进而降低阶层流动,也即政治排斥与社会排斥同样表现出链式中介效应。较少有人关注到职业教育与社会政治参与话题,本研究证实了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缺乏参与工会组织的意识和行为,从而降低了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第四,职业教育、社会排斥与阶层流动的影响效应存在城乡异质性。对于城镇群体而言,职业教育的直接效应与经济排斥的部分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性,而其他影响路径不显著;对于农村群体而言,仅存在政治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在职业教育影响阶层流动中发挥完全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为助力职业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促进阶层流动,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在保持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前提下,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提升职业教育学历层次。职业教育不应等同于低层次教育,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有必要同时提高职业教育学历层次。同时,可以考虑尝试推行“职业教育高端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政策引导与制度支持,让更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能进入职教体系,逐步改善社会对职业教育消极的刻板印象,从而扭转社会风气。

二是破除“唯学历”的社会人才评价标准,加强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综合能力的考察与筛选。由于文凭效应的影响,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遭到巨大歧视,难以获得高层次的职业机会。因此,就业市场应对职业教育人才设有

针对性的筛选标准,应根据岗位需求注重对人才学历与技能的综合考察,不应仅仅看重学历。

三是吸纳多元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重视职业院校社会权利与政治教育,提升学生获取与维护权益的能力。职业教育内容体系应当涉及社会政治权利教育,不仅要满足职教学生对专业技术技能训练的需求,还要提升其基本政治素养,掌握争取与保障自身社会福利的工具。这需要积极引导雇主与工会组织参与到职业教育当中,发挥多元主体投入的资源优势,为职业教育群体提供更多的学习与实践平台,不断培养其社会参与意识。此外,根据本研究得出的影响效应城乡异质性结论,尤其要注重职教体系中农村群体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和社会福利保障工作。

#### 注释:

①详见2018年CLDS个人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1]万恒.发展中的“中间阶层”背景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方向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1,32(1):5-8.
- [2]张英杰.从社会流动角度探析职业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关系[J].职教论坛,2007(23):4-6.
- [3]约西·沙威特,沃尔特·穆勒.中等职业教育、分流与社会分层[A]/莫琳·T·哈里南主编.教育社会学手册[C].傅松涛,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78.
- [4]曾阳,黄崑.扩大“中间阶层”:近十年我国职业教育与社会流动研究述评[J].现代教育管理,2015(1):104-108.
- [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10-12)[2023-09-2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12/content\\_5642120.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12/content_5642120.htm).
- [6][41]刘云波,张叶,杨钊.职业教育与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基于年龄与世代效应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3,44(1):128-143.
- [7][46]王奕俊,胡慧琪.“安全网”还是“分流器”?职业教育对于社会流动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FPS的证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0(7):69-84.
- [8][26]黄佳豪.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研究述略[J].理论与现代化,2008(6):97-103.
- [9]丁开杰.和谐社会的构建: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J].当代

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1):53-57.

- [10]JACKMAN M R, JACKMAN R W.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3, 38(5): 569-82.
- [11]KRAUS M W, PIFF P K, KELTNER D.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6): 992-1004.
- [12]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et al.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2, 119(3): 546-572.
- [1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4.
- [14]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J].社会,2005(1):7-27.
- [15]匡瑛,井文.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逻辑起点、实践痛点与出路要点[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Z1):9-15.
- [16]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3(6):33-42.
- [17]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03.
- [18]朱国华.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5):173-189+224.
- [19]李廷洲,邳庭瑾,吴晶.中小学教师编制的理论逻辑与治理思路[J].教育研究,2022,43(5):139-148.
- [20]丁金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质量观的探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1(1):68-69.
- [21]阿马蒂亚·森,王燕燕.论社会排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1-7.
- [22][27][35]曾群.青年失业与社会排斥风险[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35,38-42,41.
- [23]ODDBJØRN R, JON R, KNUT R, et al. Young and out: An application of a prospects-based concept of social exclusion[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9,38(1): 173-87.
- [24]JOHN PIERSON. Tackling Social Exclus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4,7.
- [25]熊光清.欧洲的社会排斥理论与反社会排斥实践[J].国际论坛,2008(1):14-18+79.
- [28]FANGEN K. Social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of young immigrants: Presentation of an analytical framework[J]. Young, 2010,18(2): 133-156.
- [29]张青根.教育信号价值在公共部门更高吗?——基于文凭效应法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7(5):27-36.
- [30]唐可月,张凤林.高校扩招引发教育信号贬值的机理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2007(3):24-33.

[31]何杨勇,祝巧.教育公平视角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与融合[J].江苏高教,2019(6):93-98.

[32]G. 佛雷塔.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A]//马丁·卡诺依.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M].闵维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8.

[33]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74-102+244.

[34]王博贤,李力行,聂卓.职业选择、职业内在价值与福利的代际传递[J].经济学报,2023,10(2):247-275.

[36]姚洋,钟宁桦.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来自12个城市的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08(5):5-29.

[37]马凯慈,陈昊.政治制度、产业关系与职业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基于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14(3):2-19+188-189.

[38]刘帅,雷鹏飞.免费义务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基于

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23,39(2):30-40.

[39]边恕,纪晓晨.社会排斥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CFPS2018的经验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21(3):87-99.

[40]王敏.社会阶层认同的性别差异研究——基于住房视角的实证分析[J].社会学评论,2021,9(6):215-232.

[42]石磊.社会阶层、代际流动与婚姻匹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6):74-81.

[43]陈纯槿.博士后的学术职业流向及其内隐影响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23,43(Z1):107-116.

[44]严霄云.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D].上海:上海大学,2013.

[45]曲正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及其制度解答[J].教育发展研究,2006(1):18-22.

[47]王水珍,王舒厅.人力资本失灵与马太效应:教育对职业分层的两极分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2):88-95.

##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Exclusion, and Class Mobility: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Zhang Luo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class mobility, but the actual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Revealing the internal operating mechan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China Labor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this study uses the 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GSEM) to examine the impact effec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exclusion, and class mobi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upward mobility of social classes, and there are three mediating pathways between social exclus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lass mobility: first, the sole mediating effect of economic exclusion; The second i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economic exclusion and social welfare exclusion; The third i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exclusion and social welfare exclusion.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lso urban-rural heterogeneity in the above-mentioned impact pathways.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promot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class mobilit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irstly, vigorously develop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hile mainta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ypes; The second i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ocial talent evaluation criteria that only rely o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examination and scree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the labor force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The third is to attract diverse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specially emphasizing the social rights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with rural backgrounds, and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to acquire and protect their rights.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exclusion; class mobility; 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